

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图书馆

王鹤鸣

今年11月30日是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百年诞辰。

王元化先生曾任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学会曾挂靠于市社联。上海图书馆新馆于1996年12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后，1997年2月，学会挂靠单位和办公地址改为上海图书馆。1997年11月，上海图书馆为加强对历史文献的抢救、整理和研究工作，成立历史文献研究所，聘任王元化先生与顾廷龙老馆长为名誉所长。

1997年年底，上海图书馆将历史文献阅览区域二楼的1206室辟为王元化先生工作室，自此，每周约有两三个上午，王老会在8时半左右自衡山路住所出发，沿高安路往北步行至上图南门，约9时进入1206室。王老到办公室，或研究商量工作，或主持在图书馆举办的学会活动，或接待学术界同行，或与海内外的友好通话，或整理文稿，或书写信函，或题写墨宝，等等，约11时离开。王老保持这种工作习惯，直到2008年5月逝世。他人生最后十年的学术生涯是与上图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王先生领导下的学会充分利用上图新馆的文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成为当时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亮点之一。以2001年的交流活动为例：3月29日至4月2日，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原主任、著名《文心雕龙》研究专家王更生教授来上海图书馆访问并进行交流座谈；5月14日下午，接待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张信刚教授率领的代表团一行16人，并于当日在上图举行座谈会，就“如何使香港成为国际大都市？”等问题进行交流；5月19日至23日，接待德国埃森人文科学院院长、历史哲学家吕森教授，他在上图贵宾室作“在历史中的跨文化问题”的演讲，并与本市部分学者进行了交流；5月27日，接待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10月30日，接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林毓生教授并座谈。前来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的，都是在海内外学术文化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其中有些是王先生提议邀请的。本世纪初，曾有人与学会联系，想以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名义开展经贸活动，承诺给予学会一

定资助，遭到王先生断然拒绝。

学会活动以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为重点，也兼及亚洲、美国和欧洲等地区。自1997年至2004年，共接待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各方文化人士150余人次。学会也派员前往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作为上海乃至全国对台工作的一个平台和载体，学会取得了海内外学术文化界的一致认可，并吸引了上海哲社界和文艺界的积极参与。

王元化先生受聘为历史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后，其中一项重要贡献是推动和指导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的抢救、整理和研究。“盛档”是1943年盛氏祠堂捐赠给顾廷龙任馆长的合众图书馆的一批档案资料，计有谕旨、奏摺、呈文、诰文、告示、照会、护照、履历、契约、章程等类别，约有18万件。盛宣怀是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因此“盛档”有着重要史料价值，有“近代中国私人第一档”之称。由于档案数量庞大，内容复杂，识别难度高，长久以来，一直没有系统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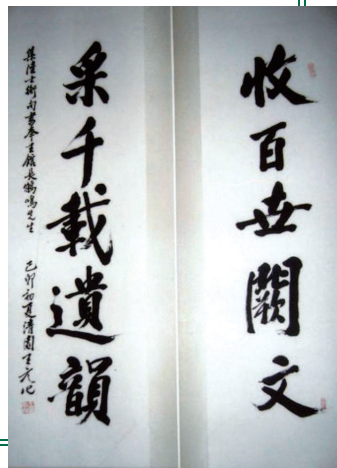
1995年10月4日，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所合并，我担任党委书记。不久，顾廷龙老馆长在长乐路原合众图书馆的书库里，指着堆放在走道地上的97个麻袋，向我介绍：“这就是盛氏祠堂捐赠给馆里的‘盛档’，‘文革’期间，陈旭麓、汪熙、夏东元等大学老师曾来整理过，他们只是分类选编资料专集，选编后的资料就放在这些麻袋里，今天无法查找原件。现在新馆建好了，需要组织人力将这些资料上架整理，按图书著录要求分类编目，便于广大读者使用。整理‘盛档’是个大工程。”

1996年12月初，《新民晚报》记者拜访王元化先生，就“盛档”的整理听取意见。王先生说：“晚清是个承前启后的时代，盛宣怀在近代史上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研究整理‘盛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果现在不整理，旷日持久恐怕要散失，年代越久，整理起来就越困难，能看懂的人也越少。”“盛档”卷帙浩繁，整理开发是一项很大的工程。王老提出，这项工作需要许多专业工作者投入，需要5年以上时间，10年之内完成已很不



↑ 王元化

→ 王元化为本作者写的条幅



错。（《承前启后说“盛档”》，《新民晚报》1996年12月8日）

正是在顾廷龙老馆长、王元化先生等呼吁下，上图加强了对包括“盛档”在内的历史文献的抢救。1997年8月，抽调历史文献中心部分业务骨干，专门成立“盛宣怀档案整理组”，由冯金牛任组长，并聘复旦大学历史系陈绛教授、《解放日报》高级记者丁凤麟为顾问，按图书馆对档案文献整理的规范，开始了“盛档”的整理。整理组对“盛档”进行了一页一页整理编目工作，入选档案以年代先后为序，至2005年底完成全部编目。在此基础上，至2008年8月，“盛档”元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建成，计收录“盛档”157564件，为“盛档”完整地向社会开放查阅创造了条件。正如王老估计，此项工作整整花了10年时间。期间，他始终关心这项工作，也提供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包括建议争取国家项目经费资助来推动“盛档”出版。王老提出，如能申请到国家清史项目的立项则很好，他愿意为此敲敲边鼓。在王老鼓励下，当年下半年，我们就积极与国家清史委沟通，申报了国家清史出版项目《盛宣怀档案选编》，第二年获批立项。

2006年8月，为加大“盛档”研究力度，由上海社科院、上海图书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三家单位联合，成立盛宣怀档案研究中心，任命王元化先生为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3月15日，中心在上图挂牌成立，王老因身体原因未出席成立大会，但他为中心题写了牌匾，并送来贺信。

2008年12月，上海图书馆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正式签约，承担《盛宣怀档案选编》编纂

工作。编纂方案几经调整，历时六年，从“盛档”中精选编成《盛宣怀档案选编》。可惜，王老未能看到《盛宣怀档案选编》面世。

王元化先生对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积极指导馆藏家谱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顾廷龙老馆长等历届领导十分重视家谱文献的搜集工作，至新馆开放时，家谱数量达1.2万种，10万册，是馆藏特色文献之一，上海图书馆也是全国收藏家谱数量最多的单位。由于种种原因，家谱分散藏在南京西路老馆书库、长乐路书库和徐家汇藏书楼，部分更是堆放在书库角落里，任其虫蛀、霉变、尘封。

1997年5月，我向王元化先生汇报学会工作的同时，也汇报了上图关于抢救、整理和研究家谱文献的计划，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将分散收藏的家谱集中去尘扫霉，整理上架著录，开放专门的家谱阅览室，加强家谱的采集和搜购工作，召开研讨会，编撰出版《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第二步，联合全世界收藏中国家谱的单位，合作编撰一部反映全世界中国家谱收藏情况的《中国家谱总目》。王元化先生对这项工作大为赞赏，指出：家谱文献中，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不少资料是其他历史典籍里找不到的，对研究工作有着重要帮助；家谱文献大多是孤本，要抓紧时间深入农村，做好家谱的搜购工作，这实际上也是历史文献的抢救；编撰《总目》是个大工程，组织工作要非常细致，这也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按照王老的意见，加大了家谱文

献的整理力度。

1998年11月，上海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促进会和上海图书馆联合召开“全国谱牒开发与利用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8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1999年6月，王老主动写了一幅“收百世闕文，采千载遗韵”的条幅赠我，书法苍劲有力，不仅是对上海图书馆抢救家谱文献工作的鼓励，更是画龙点睛地指出了中国家谱整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王老的指导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计220万字，收录了11700种家谱。自2001年开始，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整理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总目》的组织编撰。该项目2001年由我申报列为“十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家谱编撰成一部联合目录，其难度可想而知。作为《总目》的主持单位，上海图书馆在经费上给予很大支持，如2001年即拨专款80万元，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启动。但光靠上图的经费显然不够。王老了解这一情况后，鼓励我向上海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申请经费，获资助10万元。王老常主动问起《总目》编撰进展，正是在他不断关心、支持下，《总目》到2006年基本完成编撰，王老也欣然题写了“中国家谱总目”书名。

自2007年以后，王老因患病常住医院。他题写的《总目》封面样稿出来后，听说王老病危，我于2008年5月1日上午，带了封面样稿赶到瑞金医院病房。他已不能言语，但神志清楚，当我把封面样稿送到他面前时，他轻微地点了点头，露出了笑容。我告诉王老，《总目》正式出版后，我会第一时间送给他。遗憾的是，2008年5月9日，王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以告慰王老的是，《总目》于200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先后荣获“2008年度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上海市第十一届图书奖特等奖”、“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奖项。这是与王元化先生十余年来对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文献开发工作的热情鼓励、积极指导和悉心帮助分不开的。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